



作家的坦率和作品的坦率

玉珍

玉珍·随想

奈保尔曾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演讲说:“感谢那些和我在一起的妓女。”这句话是比较惊世骇俗的,他完全毫无忌讳。在他人眼中这是无视道德和婚姻,而他毫不在乎,惹得负责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成员表示,给予他这个奖纯粹只是因为他的作品和文学成就。

他不介意别人的看法,他自己也说了:我只为文学服务。而那些妓女给了他一些安慰,他甚至坦言,这些妓女并不会教会他什么。奈保尔对待婚姻和女人态度的对错我不想谈,我对作家们的私生活乃至生平背景都不关心,我只读作品。当然,我这儿说的坦率不是无法无天随口乱说的意思,是建立在一定正确的价值观体系上的。我这儿说的是作品里的坦率,不是作家本人。

同样,亨利·米勒在《布鲁克林桥》中第一句讲:我的一生一直对疯子和罪犯有着极浓的亲情。这句话够直接,如果不去客观地阅读他,就会对这句话产生误解,这里不是要支持或喜爱罪犯的犯罪,而是别的情感。通过这句别有意味的话,我们会好奇,什么样的“疯子”和“罪犯”能让他产生亲情呢?这里头具有一种文学性,文学不能用非黑即白的眼光看事物,是一个“度”,也是一种艺术和审美。

语言同样坦率的有威廉·巴勒斯、波拉尼奥、凯鲁亚克、萨冈,我从他们身上总能看到某种相似的东西,无论写什么都有一股子十分闪亮,叫人叹服的力量。

波拉尼奥的《未知大学》很好,我极少在读到一首诗的时候流泪,但曾在读到一首波拉尼奥的诗时泪流满面,那种动人是一闪即逝的,又特别强烈,它触动了我内心深处对童年的情感,如果语言的纯度和真切没到一定程度,就没法在人类的内心产生震动。语言拥有神秘奇妙的魔力,文学用一己之力将所有人区分开来,又用其一己之力将所有人联系到一块儿,使他们知道并触摸自我的灵魂。

威廉·巴勒斯的语言很坦率,内容并不是我喜欢的,但语感十分高级,叛逆疯狂飞扬跋扈充满黑暗躁动和混乱,这种自传式的无情袒露和血肉剖析不得不说是某种禁忌,是一定程度对美神与真理的掏心掏肺。但巴勒斯在序中开头讲“我四十五岁从那种疾病中醒来,平静,理智,健康状况不错。”看来他经历了极为复杂的人生,如今也是真的平静理智了,谁没有经历过难堪或难言之痛苦呢?

我没有打算向全部人推荐他的书,他很自我。甚至讲述的都是粗俗的生活,但不能说为了活下去而生存生在最底层最卑贱中的人就是卑贱的。我喜欢那种极其坦率野蛮的语感,凶猛又准确。

巴勒斯曾经吸毒,当初疫情期阅读这本书别有感觉,毒品和病毒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对人的损害和毁灭难以用语言说清。巴勒斯深受毒品之害并在本书中明确表明毒品是当今世界公共健康的第一大问题。说这死亡之路的唯一出路是戒毒。他在用自己血淋漓充满痛苦与暴力的经历告诉人们,毒品的世界有多肮脏、黑暗、可怕。它直接呈现现场和危机,让人进入状态,他想到什么说什么,一点也不隐瞒和扭扭捏捏。他几乎只用一句平常话或几个词语就将人物的形象精准呈现。

我们国家也不乏这样坦率的作家,阎连科、余华、残雪,他们的语言直面人生,真实,直接,毫不留情,力透纸背,在对某些鄙视的黑暗事物面前,丝毫不献殷勤甚至有些刻薄,因为奉承邪恶和阴暗本身就是在邪恶和阴暗,当你见识过生活的黑白灰,就能理解这种表达。

小时候不太富有,在外公家翻到一些老旧得书页枯黄的古典文学作品,读得如痴如醉,比如历史章回小说《孽海花》《隋唐英雄传》《三国演义》,还有《三国演义》,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都忘记内容了,但还记得那有力的语言,粗犷直接活灵活现,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很接地气,没有刻意的雕饰,描述起风起云涌的世道人心从不是矫揉做作的粉饰和优雅,无论布满多少七零八落的历史的血污,它们依然有极高的文学水准。文学的高贵从不是应该是美好,能接受风花雪月之外的东西更重要,下水道和卑微窘迫中也有极其高贵的灵魂,能让语言的质地呈现干净高级的东西。

尖锐的,赤裸裸,野性蓬勃的语言总在揭示众生的疾苦与哀乐,体现锥心刺骨的真实记忆,优美的语言是一种鲜花,而有力量量的语言担得起绝美的处境。

观点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柒斤

近日,媒体热议“奇书”《平安经》,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本荒谬的《平安经》,恰似一面照妖镜,照出当下“胡乱贴金,阿谀谄媚,借书敛财”等诸多歪风邪气。其实,古代出书是非常严肃且不易之事,正如诗圣杜甫所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故而,每次受出书刺激和鼓励,我总自问一声:“出书给谁看?”

这些年每次被介绍,对方总问“出了多少书?”、“集子叫啥名?”当我嘴里得到“尚未出过一本书”的回答后,他们满脸疑惑:“现在出书这么便宜,怎就出一本书?”

我每年在国家、省级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大概也有上百篇、二三十万字,一年整理两本册子确实绰绰有余,出一本书花个两三万元也不是问题。但我有自知之明,尤其对待出书这个问题常以己推人。自己这些年买的看的不是中外经典名著吗?自己的书有人愿意翻吗?所以,“自助出版”对我是没有诱惑力的。

所谓“自助出版”,就是作者不仅自主创作,而且自己负责编辑、印刷、发行、投资出版和销售整个图书上市环节。对于作者来说,自助出版省却了与编辑、校对、美工、发行商打交道的过程,也使普通人在自助出版平台上出书变得更为简单。不可否认,这种出版方式跟传统出版方式相比,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其一,出版周期大大缩短;其二,能够有效抑制盗版,有助于作者向读者展现自己原汁原味的创作;其三,出版成本大幅降低,能够减轻读者经济负担;其四,能够利用了自身的优势,把传统图书达不到的那些角落的潜在读者挖掘了出来,有效地扩大了出版市场;其五,能够提高作者收入,为作者搭建更宽广、自由的创作平台。德国女作家卡里娜·巴尔西自助出版的爱情小说《樱桃红夏天》,曾一度排名亚马逊畅销书榜首。此书在网络上售价仅为2.99欧元,为传统简装本的五分之一。巴尔西还得意地说,如果由出版社出版,她只能得到5%至12%的稿酬,而自助出版高达70%的收入归了自己。巴尔西的自白对任何作者来说无疑产生了巨大诱惑。

但出书“低门槛”也造成一些“副作用”。书,出得多,出的杂,出得快,且图文并茂、印刷精良、腰封刺目,令人应接不暇。假如每一本书都言之有物,读后有所收获,且能流传后世,自然是好事,也无愧于中国这个印刷术发明国的称号。可惜坊间所见、网民所言,“硬想”、“嫁接”、“粘帖”甚至“抄袭”出来的伪书却屡见不鲜。“口水书”充斥热销书架,一些无聊、无趣、无理的读物大量出版,这样的书有人买、有人看吗?

有人问,热衷出书是“钱”和“名”在作怪。自助出一本书就真能出“名”、“挣”钱吗?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随着自助出版让电子书呈现几何级增长,一本书要在浩如烟海的电子书库中脱颖而出是多么艰难,单就图书市场的日益细分、图书阅读率艰难略升看,有多少出了书人能像德国作家巴尔西那样走运?现实中,身边许多出书人也是自娱自乐,如果不靠各种关系,一年甚至几年也卖不掉一本书。《华盛顿邮报》调查称,美国的非虚构类图书,平均每本一年卖不到250本,每1000种纸质书中仅有62本的年销售达5000本。我国的人均纸质书阅读量比美国低,无人阅读、谈何出名?无人购买,谈何挣钱!所以,面对自助出版,有出书欲望的人不妨扪心自问:出书给谁看?试想,假如《平安经》的作者保持这种清醒,还会急于出版那本荒诞不经的“奇书”吗?

和质询,莫言有自己惯常的表达,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随着《晚熟的人》问世,“闭关”了太久的莫言终于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即使身在“枷锁”之中,莫言仍旧坚持了一个作家的使命。在这八年里,他写过戏剧、诗歌,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依旧时刻关注着家国的变迁,关注着周围的人和事,并用精彩的文字讲述着这些人这些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莫言还是那个莫言。

《晚熟的人》正是这样一部脱去“桂冠”,回到写作本身的作品。

读后

霓喜的连环套

周丽

这几日紧赶慢赶,终于将《连环套》又读了一遍。年纪大了,很多情节已经全忘记了。只读了几页,快要以为作者只是写一个肥胖的赛姆生太太的后半生时,小说提到了几张旧日的像生命的碎壳一样的照片,一个年轻女子的大半生被拉开了序幕。

这个女子就是赛姆生太太,她的小名叫霓喜,十四岁以前一直长在广东一个偏僻的村里。她终日穿着黑土布,是那种让人抑郁的黑色,一不小心就会被养母打得死去活来——霓喜一辈子对于黑色有一种忌讳,因为它代表贫穷与磨难。

好在霓喜长得有几分颜色,有“一种流动的美”,她像一个叫雅赫赫的印度生人看中了,在一番赤裸裸的讨价还价之后,梳着两个丫髻的霓喜终于得以离开那个连做梦也不愿意梦见村庄的连下去时——老头子病死了,霓喜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反而弄得个心力憔悴,带着孩子逃也似的跑了。

至于霓喜遇到的第三个男人,仍然只是贪图她仅存的那点美貌,最终还是没维系太久,用一张五千元的支票算是了结了霓喜的洋太太美梦。

所谓连环套,顾名思义,一个套一个的圆环,这是霓喜自己的连环套。为了活下去,她只得用自己的美貌去套住一个又一个男人,然而终究一个个男人离她而去——她跌得很惨。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张爱玲其他作品中,《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这些女性被困在命运的罅隙中,一辈子不管怎么抗争也无济于事,因此《连环套》与《金锁记》是对霓喜这个女子的嘲讽和同情,不如说是张爱玲用苍凉的笔触概括了那个时期很多女性的形象和命运。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张爱玲的出现可以用“惊艳”一词来形容,有人为她叫好:“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傅雷先生也说张爱玲的出现,是让人始料不及的“奇花异卉”,特别是《金锁记》,“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然而她对于《连环套》却断言“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他认为张爱玲太醉心于玩技巧,太过于炫技,在题材方面,也

仅限于男女,而没有关注男女之外的辽阔的世界。

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傅雷先生深刻而敏锐的洞察力让人佩服。但年轻的张爱玲对傅雷的批评是很不以为然的,她在《自己的文章》为自己作了一番辩解,在她看来,她的小小说大都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只是“时代的广大负荷者而已”,“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张爱玲不会料到,三十多年以后,她对自己当年写的《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更为苛刻的自我批评。

我也不否认小说内容贫乏,故事拼凑痕迹明显,且繁琐拖沓,可我却认为一个作家若能写好某个时期的世俗男女,能写出点烟火味来,已经是功莫大焉。

不过我又希望霓喜在离开那个偏僻的乡村后,能够读点书,长点见识,让自己成长为一个自立自强自爱的女性,像《半生缘》里的曼桢那样,即便是跌落至谷底,也能够重新爬起来,带着满身伤痛,靠自己继续活下去。

当然,这个想法也许不合作者的初衷。



悦读拾萃

马立明

退休后我除了写字画画,主要就是读书了。这是我的近期的一些“悦读拾萃”,既觉得有趣,又觉得有所悟,就在此和书友们分享了。

冯其庸手抄《石头记》

冯其庸是著名的文史专家,以研究《红楼梦》著称于世。几年后,他珍藏的一册影印庚辰本《石头记》在“文革”中被抄走。这件事令他很是着急,他明白这部珍贵的书籍肯定有去无回。想来想去,他托好友秘密从图书馆里借到一套庚辰本《石头记》,准备一字不落地点抄完。就这样,他从1967年12月开始抄写,一直抄到1968年6月才抄写完毕。更加令人感慨的是,全部是用毛笔来抄写的。

当时,一些朋友认为那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根本用不着花这么大的心血去抄写。对此,冯却认真地地说:“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就算付出一点心血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通过自己的抄录,意外地感受到了许多隐藏在书中的内容,这种感觉自己之前从来

没有体会到过,可以说是意外之喜吧。”

沈从文的“耐烦”

沈从文一生信奉踏踏实实做事、做人,用他的话说就是做任何事都要“耐烦”。沈从文写文章勤奋“耐烦”,文章一遍遍地修改;他批改学生文章用心“耐烦”,有时在文稿上写的建议比原作正文还要多;他编辑文艺副刊也非常“耐烦”,他的修改、推荐、转寄稿费及发出的鼓励信件,使许多青年作家后来成了他的知心朋友。沈从文的这种勤奋和“耐烦”,自然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敬仰。

作家的避客方法

许多作家为躲避应酬之累,想出种种避客之法,颇为有趣:1988年,由于长年伏案写

作,刘绍棠积劳成疾,造成左体偏瘫。而又终日埋首于“蝈笼斋”创作的他,特在门口挂一硬纸牌,上书《敬启》一首:“重疾致残,今非昔比。医生严嘱,必须静养。每日上午,绝不接客。下午接待,四时半后。电话预约,以免枉驾。迫不得已,尚希谅解。人道主义,请君奉行。”他采取的这种文字游戏形式表达惜时谢客之举,博得来访者谅解。

老舍却用“四请”之法来打发那些“不速之客”。每当这类客人登门时,他照样很热情地接待,先是客气地说:“请坐!”然后递上一杯茶:“请喝茶。”再递上一支烟:“请抽烟。”最后再拿出一些画报说:“请看画报。”“四请”之后,老舍就继续埋头写作。客人见他太忙,抽烟、喝茶之后便知趣地起身告辞。

1.《晚熟的人》



作者:莫言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今年距莫言获诺贝尔奖已经过去8年,距他出版一部小说已过去了整整十年。十年蕴积,人事全新。《晚熟的人》中,莫言根据乡土,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用十二个故事讲述获诺奖后的里里外外。十二个故事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个世纪到当下社会,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这一次,莫言将笔触延伸得很长、很远,但距离你我优势如此的紧密、亲近……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公众的关切

和质询,莫言有自己惯常的表达,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随着《晚熟的人》问世,“闭关”了太久的莫言终于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即使身在“枷锁”之中,莫言仍旧坚持了一个作家的使命。在这八年里,他写过戏剧、诗歌,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依旧时刻关注着家国的变迁,关注着周围的人和事,并用精彩的文字讲述着这些人这些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莫言还是那个莫言。
《晚熟的人》正是这样一部脱去“桂冠”,回到写作本身的作品。

2.《煤气灯效应》



作者:[美]罗宾·斯特恩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书籍介绍:这是一本心理学书籍,实质上探讨的仍是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争夺。比起感受,我们总是更在意谁对谁错。全书在表达这样一种思想:你要对自我认知足够坚信,不必过度寻求他人的肯定,甚至无形中将对对方幻想为理想形象,要知道这世上不存在十全十美之人。全书有非常完善地对于人际操纵的分析。为什么好好的人会彻底否定自己,完全陷入对方的泥沼?一个人被操纵有哪些表现,又会带来哪些后果?为什么你会配合对方跳“煤气灯探查”?如何结束不健康的关系?
“煤气灯效应”一词来源于1944年的电影《煤气灯下》,讲述了丈夫安东尼不断对妻子芭拉进行精神操控从而使其发疯,最终霸占其财产的故事。“煤气灯操纵”是一种阴险的情感虐待和操纵形式,很难识别,甚至很难摆脱。这是因为它触发了我们内心无比恐惧的诱因——被遗弃;还触发了我们内心深切的被理解、被赏识和被爱的需求。

荐读